

由《广志绎》看明末文人的民生思想

杨春

DOI:10.32629/er.v2i2.1667

[摘要] 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统治者却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国错失近代化的机遇。那么,介于统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高级官员,应得到关注。他们身为统治阶层,其思想主张会有加强皇权、维护统治的倾向;而作为知识分子,其布衣出身或早年游历的经历,会使他们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王士性仕途坎坷,“宦辙几遍天下”,其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思想在《广志绎》中得以充分体现,具有典型性。对其思想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明王朝为何在商业繁荣的情况下没有走向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明代中晚期; 王士性; 广志绎; 民生; 近代化

1 时代背景与作者其人

正如余英时所言,明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以及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使得明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逐渐繁荣。但在中国即将迈进近代化的门槛时,明王朝中央却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那么,介于统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文人阶层,因其特殊身份,便应得到我们的关注。一方面,明代文人可以通过科举等形式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其思想主张会有加强皇权、维护统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其布衣出身或早年游历的经历,会使他们得出自己独有的、有别于朝廷的结论。对明代末期文人阶层的思想考察,不仅有助于对明代思想史的梳理,也有助于理解明王朝为何在商业繁荣的情况下没有走向现代化道路。

文人阶层因其统治和被统治的双重身份而具有研究价值,应选择出身布衣,历经宦海沉浮,并且游历广泛的中级官员为研究对象。这类官员曾是百姓中的一员,相比于贵族乃至皇族,其立场相对贴近人民,并且能够发现王朝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则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思想见地。而如果历经官场的起落,并有外放任职的经历,那么他们便会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政策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看得更加实际而长远。王士性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王士性出生在临海城关的一个早已落魄的宦宦之家;但因勤奋好学,被其族人王宗沐收养为继子。《临海县志》记载王士性“为诸生,读书过目成诵。性磊落,不群不治……家甚贫”¹。他于万历元年(即1573年)中举人,四年后又中进士,由此开启了为官生涯²,直至万历二十六年(即1598年),卒于鸿胪卿任上。因得罪皇帝而被外放做官的坎坷经历,和“足迹欲遍五岳”的志向,使得王士性观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研读其著作是了解王氏思想的最好方法。《广志绎》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是王士性晚年的作品,其中第六卷《四夷辑》的内容已散佚。现存的五卷记录了塞北、江南、江北、广西、云贵等地的名山大川、风

俗习惯、社会历史状况,描写细致入微;并且通过对比、寻访等方式探究当地习俗、生产方式的成因,交叉互证,评价客观,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广志绎》也因此被世人所重视,广泛引用或整本收录进《浙江通志》、《日知录》、《翠娱阁评选十六名家小品》等著作。

2 研究现状

关于王士性及其《广志绎》的研究,始于1985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徐霞客研讨会上发出的倡议。这篇题为《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的倡议,被朱荣收入《纪念徐霞客论文集》³。三十余年来,各方学者对王士性的定性是“人文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前者以周振鹤⁴、孙光辉⁵等人为代表,后者以李跃军⁶、陈宝良⁷、姜丽丽⁸等为代表。虽然对于王士性及其《广志绎》的评价相对中肯,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忽略了官员、文人身份的特殊性。当下研究者对于《广志绎》定位,也常是“人文地理学著作”,并盛赞其为“不可多得的奇书⁹,有失偏颇。现有的对《广志绎》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已散佚的《四夷辑》进行文献学上的考究¹⁰;二是注重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侧重于地理学与地方志的探讨¹¹;三是对王氏旅游思想的“深度挖掘”,生硬地证明王氏具有“现代旅游”乃至“发展现代旅游业¹²”的意识。而将王氏与《广志绎》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基于王氏的个人经历与笔记体散文的特殊性而对其政治思想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出现。

《广志绎》的点校者吕景琳先生将此书定性为“关于地理的笔记¹³”。关于其他描写地理、风俗的作品,王氏认为“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不可信;而“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王氏“宦辙几遍天下¹⁴”,书中内容多是早年在各地为官时的见闻,回忆录的性质,然有详略、深浅之分,但始终带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教化、管理眼光。因此在研究时,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笔记体著作,并对作者所持的立场、态度进行关注。

笔记体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书写者“信而有征地表述一

件具体特定的社会事实”,展现“生活的真实塑像¹⁵”。而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作品是作者心态的投射与反映¹⁶。清代杨体元在提到《广志绎》时,说王氏“可谓有天下之志¹⁷”。这句中肯的评价被中华书局收入《广志绎》,作为其序言的一部分。而王士性本人也提到了该书“解颐”和“经世”的双重作用。因此我们不应沉迷于《广志绎》的文学性,也不能将每个字都奉为信史;而应透过该书看出作者思想和态度。

3 民风与民生

《广志绎》记录的是王士性在各地为官、游历时的见闻。王氏说书中内容“皆身所见也¹⁸”,宁缺毋滥。而各地的风土人情,是王氏关注的重点。目前许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展开了初步的探究。例如范宜如在《文化图景的形构:王士性〈广志绎〉之地方知识与叙事》中引用了和辻哲郎在《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中的理论,即,“风土”并非仅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相应于气候、地形、风俗等景观,在历史脉络底下所积累的与环境相融的智慧¹⁹。但范氏对《广志绎》的研究仍然没有人文地理的学科桎梏。而作为外来的官员,王士性面对不同风俗的态度正是我们窥探其立场主张和价值取向的窗口。本文拟采用范宜如的思路,梳理《广志绎》中,王氏隐藏在风土人情背后的民生思想。

文中王士性到过许多地方,面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方式,他的第一反应是考察当地自然状况,而非妄加评议,例如“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²⁰”。对各地的不同风俗,他极少表态,也不强求每地的民众都要整齐划一地按照同种方式来生活。“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奶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²¹”的看法,可以看出其作为地方官员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

王士性对各地的不同风俗持开放态度,极少褒贬。这不代表王氏远离政治中心后就不再关注民生。相反,《广志绎》中有很多内容可以体现出他不尚空谈,关注民生的思想。全书中,“民”字出现了143次,多出表现民生艰难,例如“土州民既纳国税,又加纳本州岛赋税……又土官有庆贺、有罪贖,皆摊土民赔之,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又刑罚不以理法,但随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²²”的描写等等。

王士性对民生的关怀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和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的。《两都》卷中记录了淮阳地区连年水患的状况,“建闸修渠,金钱以万计,不两年为灶丁阴坏之。又盐城民惑于堪舆之言,石舸闸间启闭亦虚,止庙湾一线通海耳……尚幸主义者见其难而中止耳。若从其请,欲尽从庙湾一线出,则高宝五郡邑沮洳昏垫之民永无平陆之期,畝亩赋税公私不将尽废矣乎!²³”王士性虽未偏袒官民中任意一方,但他对群体性运动的看法,除同情之外,也是带有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考虑的。

他徘徊在官民之间的感情,在面对好争斗、好诉讼的新

都²⁴人民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地本勤,人本俭……若巨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醮金出死力……无非亦为己身地也²⁵”。在这种有节制的同情之外,王氏也并没有提供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从《广志绎》来看,王氏对人民的批评也不在少数。中州“诸果品味胜,为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宽²⁶”,却无人耕种,“真惰农也”。

王士性虽未明确指出官民对立,也不像《种树郭橐驼传》中乱指挥的官吏,但其爱民思想,也是站在维护统治的基础上的。

4 商业思想

中国古代的商业思想一直是思想史,尤其是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热点。而封建社会末期,商业是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此时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的态度,将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起到很大的影响。现有的从明代文学作品中分析当时商业发展的研究成果²⁷,大多集中于《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作品,没有对《广志绎》中的商业进行研究的。此外,对于明代知识分子商业思想研究的成果,多集中于倪岳、高拱、庞尚鹏、李贽²⁸等人的主张,而对于明代中层官员商业思想的分析则比较缺乏。在以往观点看来,以王士性为代表的明代中层官员,既没有明确阐释自己商业思想的著作,官阶又不够高,难以影响整个王朝大政方针的走向。但在笔者看来,这批官员往往是维持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她们又因为布衣出身、仕途坎坷,而对这个社会有着更加清醒、全面的认识,其商业思想反而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对商业发展的主流态度。《广志绎》体现了王士性的一部分商业思想。

王士性对商业和贸易的看法,大多来自于实地考察,并且有一定先进意识。宣府和大旁²⁹两地常年困苦,“本今互市定,则宣、大为缓³⁰”。可以看出王士性意识到了商业的好处。在王士性看来,商人在西南地区的开发上也有一份功劳,“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³¹”。

但同时,他对商业的态度并不是一味提倡的。即使是在宣府和大旁,王氏依然认为,“然此事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新郑相在内主之,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新郑良险诈恣横,然胆略当为盖世才子,而互市一断,实有功于国家³²”。全书以记叙、说明为主,王士性难得的一次议论便是否定商业,其态度可见一斑。王士性对于海运也有担忧,“长山、沙门诸岛……往者皆有禁,后郑中丞因新兵乏饷,疏垦以助之……此田皆当于农时搭厂以居,隙则毁之以归,若架屋常住,恐窝引海寇,为患浙、闽间矣³³”。而在考察商业发达的扬州时,王士性的关注点既不在当地有没有出现新的生产方式(例如雇佣关系)、生产设备,而是当地豪民富商“其势足以动摇上官³⁴”。

王士性与其堂弟王士琦、王士昌,都曾中进士,入朝为官。《明史》中《列传第一百八十一·忠义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列传第一百三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川土司二》、《志第七十三》、《志第七十五》³⁵等篇目都有关于其兄弟事

迹的记载。可以说, 王士性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官员的典型代表。他的看法可能就是很多人的心声。作为统治者而言, 对民众最大的忌憚不是缴不上税, 而是暴乱。愚民、抑商、海禁等政策, 都源于此。因而可以推断出, 明朝的中后期的顶层统治者在面对日益蓬勃的商业和逐渐壮大的商人群体时, 会采取压制而非鼓励的政策。

5 结论

我们不能说王士性不是一个好官员。他的笔记体著作显示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 谨遵格物致知传统, 不尚空谈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不关注民生, 《明史·志第六十·河渠二》³⁶中, 记载了他关于治理水患而与同僚辩论的事迹:

初, 黄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 其河深且近洪, 能刷洪以深河, 利於運道……嗣後水發, 河臣輒加堤, 而河身日高矣……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黃河故道。大略言: “自徐而下, 河身日高, 而為堤以束之, 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 流益迅, 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紛紛之議, 有欲增堤泗州者, 有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 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不如復河故道, 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面对富豪袁广汉逾越礼制兴建豪宅的事情, 他的态度不是死守等级制度, 而是同情普通百姓³⁷。

茂陵富民袁廣漢, 築園於北山下, 構石為山, 高十餘丈, 養白鸚鵡、紫鸞鴛……奇草異樹, 重閣修廊, 移刻行不能遍……袁園稱東西四里, 南北五里, 則亦周十八里。今極稱吳中佳麗, 然縉紳中何得有此, 況民間乎?

只是囿于政治立场与知识水平, 他难以描绘出对未来社会构架的蓝图。但在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制度和农业立国的经济体制下, 我们这样要求一位靠熟读四书五经而走上仕途的官员, 也未免太苛刻了些。

注释:

1 张寅. 浙江省临海县志·王士性传[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165.

2 历任朗陵(今河南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迁吏科给事中、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等职。

3 朱荣. 徐霞客研究文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235-247.

4 周振鹤.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J].东南文化, 1993(1):19-25.

5 孙光辉. 论《广志绎》的人文地理学贡献[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师范大学, 2011.

6 李跃军. 浅论王士性的旅游观[J].台州学院学报, 1999(4):49-51.

7 陈宝良. 明代旅游文化初识[J].东南文化, 1992(2):258-262.

8 姜丽丽. 论《广志绎》中的旅游思想[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12):31-32.

9 丁锡贤. 王士性及其《广志绎》[J].东南文化, 1991(5):116-117.

10 此方面的研究有杨继光的《〈广志绎〉勘误一则》, 易山明的《论王士性〈广志绎〉内容编排的独特性》等等。

11 此方面的研究有孙光辉的《从〈广志绎〉看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

貌, 周克虎的《从王士性〈广志绎〉管窥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 范宜如的《华夏边缘的观察视域:王士性〈广志绎〉的异文化叙述与地理想象》等等。

12 此方面论述有王振刚的《从〈广志绎〉看晚明地理学发展的新气象》, 徐建春的《徐霞客与王士性》等等。

13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

14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5.

15 [美]吉尔兹著, 王海龙, 张家瑄.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78.

16 皮埃尔·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7.

17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7.

18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9.

19 范宜如. 文化图景的形构:王士性《广志绎》之地方知识与叙事[M].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 2011:19-22.

20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31.

21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4.

22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13.

23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29.

24 新都:今苏州及长江以北部分地区。

25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34.

26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38.

27 此方面的研究有黄琛的《从“三言”“两拍”看明代商业及其道德》, 姜守鹏的《〈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 谭广旭与刘奇玉的《从“二拍”识明代商业》等等。

28 此方面研究有李博的《明代商税思想初探》, 王裕明的《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 于浴贤的《李贽经济思想管窥》等等。

29 宣府:今河北宣化县及其周边地区。明正统元年(1436年)设巡抚宣府。

30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0.

31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56.

32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2.

33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63.

34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26.

35 (清)萬斯同.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36 (清)萬斯同. 明史·志第六十·河渠二,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37 王士性. 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 1981:58.

参考文献

[1]张寅. 浙江省临海县志·王士性传[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165.

[2]丁锡贤. 王士性及其《广志绎》[J].东南文化, 1991(5):116-117.

[3]杨继光. 《广志绎》勘误一则[J].江海学刊, 2013(5):136.

[4]吴宏岐, 闫希娟. 从《广志绎》看王士性的军事地理思想[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0, 20(4):59-62.

[5]陈宝良. 明代旅游文化初识[J].东南文化, 1992(2):258-262.

[6]周振鹤.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J].东南文化, 1993(1):19-25.

[7]姜丽丽. 论《广志绎》中的旅游思想[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12):31-32.

- [8]徐建春.王士性及其《广志绎》[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51-55.
- [9]彭勇.从《广志绎》看王士性对于山东海防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08,27(12):52-54.
- [10]朱荣等编.徐霞客研究文集——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1]王振刚.从《广志绎》看晚明地理学发展的新气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9(2):172-173.
- [12]杨森,陈赉福.王士性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J].台州学院学报,1995(4):75-78.
- [13]滕兰花.从王士性的《广志绎》看明代广西地区开发的差异[J].广西地方志,2009(3):25-29.
- [14]龚剑锋,温正灿.从王士性《广志绎》看明代贵州人文自然风貌[J].贵州文史丛刊,2016(1):91-95.
- [15]周克虎.从王士性《广志绎》管窥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33(3):13-19.
- [16]易山明.论王士性《广志绎》内容编排的独特性[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28-32.
- [17]郭涛,王舍梅.《广志绎》校点意见四则[J].历史地理,2015(1):294-297.
- [18]孙光辉,龚剑锋.从《广志绎》看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貌[J].萍乡学院学报,2011,28(2):63-66.
- [19]孙光辉.论《广志绎》的人文地理学贡献[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1.
- [20]金一波.浅析《广志绎》中所见有关云南的若干问题[J].消费导刊,2008(9):209-209.
- [21]刘孔伏.《广志绎》原为六卷足本考[J].图书馆,1989(4):61-62.
- [22]李跃军.浅论王士性的旅游观[J].台州学院学报,1999(4):49-51.
- [23]李博.明代商税思想初探[J].中州学刊,2012(2):142-147.
- [24]赵林娜.明代商业思潮与《三言》《二拍》[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0(6):97-99.
- [25]贺葵.从西门庆看明代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及特征[J].贵州社会科学,1994(3):102-105.
- [26]黄琛.从“三言”“两拍”看明代商业及其道德[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 [27][美]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8.
- [28]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1989(3):35-41.
- [29]谭广旭,刘奇玉.从“二拍”识明代商业[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10(3):13-16.
- [30]王裕明.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3):144-151.
- [31]于济贤.李贽经济思想管窥[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27(3):1-6.
- [32]李仁,吴杨婷.李贽经济伦理观简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27(3):11-16.
- [33]范宜如.华夏边缘的观察视域:王士性《广志绎》的异文化叙述与地理想象[J].台湾国文学报,2017(4):121-151.
- [34]范宜如.行旅·地志·社会记忆:王士性纪游书写探论[M].台北:台湾万卷楼出版社,2011.
- [35]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记忆:论王士性纪游书写中的江南叙述[J].东华中文学报,2011(3):43-45.
- [36]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作者简介:

杨春,(1995年2月—),女,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汉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通讯地址:

Block 602, Clementi, West St. 1, #08-20 Singapore (新加坡)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中路 369 号义乌商报社 杨光洲 收转 (中国)

邮编:

120602 (新加坡)
322000 (中国义乌)

电话:

65-85891985 (新加坡)
13868968939 (中国)